

“降噪”不应是考生的专享“福利”

■公民论坛

□张德华

各地纷纷在中高考期间专项整治噪音污染,暴露了噪音污染早已成了不少地方的顽疾,成了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老问题。有鉴于此,负有治理职责的相关部门不能轻忽对噪音污染的常态化治理——“降噪”不应是每年一度的中高考学生“专享”的“福利”,而应是每个市民都能拥有的权利。

又到高考季,各种关爱考生、为高考护航的“新闻”纷纷归来。为保证广大考生能有一个安静的学习、考试、休息环境,防止和减少噪音干扰,各地陆续开启“静音模式”,严格控制环境噪声污染。

据报道,北京市地安门派出所日前约谈多家重点酒吧负责人,要求各酒吧从3日晚开始音响一律放于室内,音响设备运行期间一律不得开门开窗,确保边界噪声符合国家标准,低于50分贝。对群众反映存在噪声扰民问题的酒吧,加大执法力度,发现问题立即约谈,进行整改或处罚。如屡教不改,将会同文化部门对其进行停业整顿。此前,多地已经推出中高考期间的“降噪”措施。比如,杭州中高考“禁噪令”规定,除抢修、抢险工程

外,杭州市区所有建筑工程在6月1日22时至6月8日6时、6月12日22时至6月18日6时期间,禁止夜间施工作业;合肥交警部门停止核发6月1日至16日的渣土车通行证;厦门高考限噪也于6月3日起实施。

各地为高考而全力“降噪”,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。但笔者想说的是,“降噪”不能只为高考,而应常态化、长期化,努力让每位市民的日常工作与生活都能远离噪音污染。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曾指出,噪声污染已成为空气污染之后影响人体健康的环境因素。如长期受噪声干扰,就会出现失眠、神经衰弱、头晕、视觉疲劳等症状。各地纷纷在中高考期间专项整治噪音污染,暴露了噪音污染早已成了不少地方的顽疾,成了严重影响居民生活

质量的老问题。有鉴于此,负有治理职责的相关部门不能轻忽对噪音污染的常态化治理——“降噪”不应是每年一度的中高考学生“专享”的“福利”,而应是每个市民都能拥有的权利。

即便从法治的角度出发,“降噪”也不能只为了高考。我国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对噪音的分类给出了明确的界定;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对污染源的执法检查等也有明确规定,但是从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,对待噪音污染,可以选择时间段执法。也就是说,负有噪音污染治理职责的相关部门,如果只在中高考期间才“打起精神”,在某种意义上恐怕也是一种选择性执法或懒政。

其实,常态化的“降噪”并非不可能。每年高考、中考期

间各地的“降噪”成效就表明,这些特殊时段通过严管能够做到的,日常也一定能够做到。要让城市安静下来,让那些制造噪音的企业单位和个人收敛起来,必须提高违法成本,注重受害人权利维护,赋予执法机关更多权限。2015年1月1日起执行的新环保法对于噪音污染增加了按日计罚、查封扣押、限产停产、行政拘留等条款,提高了违法成本。对噪声扰民情节严重的,多个职能部门可联合执法,互相配合、主动作为,形成合力,噪音扰民问题应该能得到及时的处理。

如此一来,谁还诚愿“以身试法”而不把噪声扰民当回事呢?如此一来,又何须到了中高考的时候才想起着力整治噪音污染?

■一家之言

□譚浩俊

在日前举行的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,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指出,中国在探索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方面已经走在了国际第一梯队,但普惠金融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。他表示,金融不能只为少数精英群体服务,而应更加关注民生、注重社会责任、关心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等重大现实问题。

普惠金融,决不只是金融机构单方面就能全面实现的。如果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,没有全方位重视“普惠”二字的氛围,仅靠金融机构是做不到也做不好的。政府对普惠金融的认识,以及在普惠金融中的表现,是普惠金融能否真正“普惠”的关键。要知道,如果政府真正重视普惠金融,就一定

定会在政策、舆论等方面,给予明显的导向作用和方向指引,就会鼓励金融机构去发展普惠金融。

现在的问题是,在不少地方政府的字典里,并没有真正的普惠金融几个字,而只有大企业、大项目,城市建设、房地产开发等,金融机构的信贷资源,也只能围着这些方面转,而不可能进入普惠金融的行列。一旦有大项目、大企业落地,不管是不是好项目、好企业,地方政府就会要求金融机构全力支持,并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、行政资源等配合金融机构做好大企业、大项目的金融服务工作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金融机构不仅不会再去关心普惠金融,甚至会把原本“普惠”了的资源也收回来。所以,要让银行安心做好普惠金融工作,就必须从政府入手,确立“普惠”意识。

同时也应看到,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,在制定考核目标、

明确部门和员工责任方面,都是对普惠金融明显不公。在考核方面,都是看给大企业、大项目放了多少信贷资源,获得多少效益,而极少关心在普惠金融方面的成绩。结果是,凡是从事大企业、大项目的部门和员工,收入也都比从事普惠金融的高。而在责任追究方面,由于大企业、大项目大多与高管密切结合在一起,涉及的部门和人员也比较多。一旦出现风险,追责的目标很大、范围很广。于是,追责的力度明显偏小。相反,对普惠金融出现风险的追责,则要明确和力度大得多。慢慢地,对从事普惠金融的部门和员工来说,也就出现了宁可少拿效益收入,也不要冒险增加效益的现象。最终受伤害的,也就只能是中小企业、三农等了。

另外,受整个市场信用环境和管理秩序的影响,能够有条件享受普惠金融服务的群体自身也存在很大的缺陷。如财务资料不全、没有规范的资产

负债表、没有专职财务人员、没有按照财经纪律要求建立财务档案、信用不佳、信贷资金缺少保证等,也是金融机构不愿深入开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方面。要知道,没有完善的财务手续和程序,资金管理和使用就无法监管,风险就难以防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指望金融机构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,把责任推给金融机构也是不合理的。

有人建议,应当大力发展政府层面的为中小企业、三农等服务的担保机构、担保业务。粗粗一听,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但是,不要忘了,如果企业的信用不建立起来,不在财务管理方面下工夫,把财务档案建立起来,政府担保就极有可能成为少数不法分子、信用不佳企业、缺乏道德标准者的可乘之机,从而造成国家财富的损失和浪费。毕竟,普惠金融是一个大课题,一个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课题。

大闹机场的女博士注解了“新文盲”

■试说新语

□毛建国

出国参加重要会议,因迟到无法办理乘机手续,乘客掌掴机场工作人员。6月1日上午,武汉某大学女博士张丹(化名)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殴打值机柜台值班员,被机场警方行政拘留10日。据了解,张丹已被法航列入黑名单,在国内9个通航点对其拒绝承运。

因为大闹机场而被行政拘留10日,据了解,“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因违反法律法规和民航规定而受到的最严厉处罚。”如果说这是阵痛的话,那么被法航列入“黑名单”,以及“机场地服亦在向民航局申请,将其列入中国民航黑名单旅客”,这可算是长痛了。此时此刻,这位女博士可能会有一种“冲动是魔鬼”的后悔。

事件发生后,很多人关注

这位女博士的学历标签。应该看到,这只是一起个案,不能因为这位女博士怎么样,就认为博士们都怎么样。“傲慢与偏见”,是对其他博士的不公平和不负责。但这一事件的发生,还是很值得思考,那就是在现代社会中,到底什么样的人、什么样的行为,可称得上“文盲”。

过去人们对文盲的认识,一般是指没有文化,没有多高的学历水平。而在现代社会背景下,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,不认识字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但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文盲问题就不突出了?当前很有必要给“文盲”注入新的内涵,那就是文盲不仅是文化知识的缺少,更是指文明素养的缺乏。从文明素养这一维度出发,我们会发现,现实中存在很多文盲,甚至是很多“高知文盲”。

分析这位大闹机场的女博士的行为动机,有人认为是规则意识缺失,对规则没有一点敬畏感;也有人认为是情商捉

急,缺少必要的沟通能力;还有人认为是权利意识薄弱,不知道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。这样的分析自有道理,但从根本上讲,还是文明素养不够。如果这位女博士有基本的文明素养,那当发现迟到后,就会接受工作人员的建议和协调,而不会做出冲动之举,更不会有后来的“短痛”与“长痛”。真正值得思考的是,文明素养与文化素养之间,到底有没有关系?

在一般人看来,一个具有文化素养的人,也往往具有较高的文明素养。孔子讲,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。人们对知识的掌握,往往有一个过程,而在文化知识增进的过程中,文明素养也往往水涨船高。从整体上讲,文化素养与文明素养有正相关关系,一个教育程度发达社会,其文明水平比教育欠发达社会要高。这也是努力推进教育的意

义所在。

但人们也发现,具体到活生生的人,一个人的文化素养与文明素养,却可能存在脱节。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的横行,就说明了这一点。出现这种情况,既有个体的原因,也有教育的偏失,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,当前的教育出现了问题。这也是人们一直感叹的,现行的教育,侧重于“授业解惑”,而在“传道”上远远不够。这也是很多人具有很高的学历文凭,却依然做出让人不屑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可以说,这位大闹机场的女博士注解了“新文盲”,其行为告诉人们,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大量“文盲”,其表现不是文化知识的缺少,而是文明素养的不足。如何才能避免成为“新文盲”,特别是避免成为“高知文盲”,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必答题。

■投稿邮箱:
qilupinglun@sina.com

■媒体视点

避免“顺丰菜鸟之争”

需建利益协调机制

备受关注的顺丰菜鸟之争,在国家邮政局介入协调后,出现了转机。6月3日12时起,双方全面恢复业务合作和数据传输。这场两方互怼、多家企业“站队”的对垒,也由此告一段落。

顺丰菜鸟之争,无疑暴露了蓬勃向上的电商及快递行业之间关系的诸多不确定性:今天,顺丰与菜鸟发生了不愉快,就贸然切断相关数据接口;明天,如果另一家快递企业与物流企业发生矛盾也如法炮制,等于将两家企业内部问题演变成对外部消费者和商家的权益绑架。

这么一来,消费者和商家们必然担心,自己的正常交易会随时被封杀、物流极易受影响。电商和快递市场可能因为不断停摆,而造成行业危机。顺丰菜鸟也好,其他电商平台及快递企业也罢,都应意识到,把电商与快递关系从相互依存变成彼此对立,无助于各自行业的长远发展。电商与快递相关企业共同研究建立利益协调和联动发展机制,很有必要。

这类利益协调机制,涉及产业之间的规则磨合和商业协作框架的制定。就物流数据而言,有必要由监管部门、行业协会等协调,牵头制定关于数据分享和数据安全保护方面的行业规范,明确“可共享/非共享”数据,也明确各方在数据共享和数据安全保护上的权利和义务。而相关企业也可在此约束框架下建立某些联动发展机制,协力进行全链条数据连接,实现严密的数据保护体系。

电商业与快递业的联动协调机制,要在几个方面发挥作用。

首先,对于日益重要与敏感的数据,任何企业都不应越界,快递企业和电商平台之间的数据对接应开放到什么尺度,需要互相协商把握。物流信息数据的开放应该是分层次、分阶段,逐步对接。

其次,快递及电商行业暴露出的服务层面问题,如野蛮分拣、刷单所造成的造假及快递人力成本浪费等,也可通过联动协调机制,形成电商平台与快递企业的相互监督、行业自律,从而消除此类灰色现象,推动服务精细化、科学化。

(摘自《新京报》)